

明清时期的县城： 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释析

罗艳春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7)

[内容提要] 本文从地域社会史的视角出发,以绘制于道光四年的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为研究对象,对图中或显或隐的诸内容及其史料进行重新梳理与讨论,揭示在整体史理念下认识明清时期县城的研究路径。明清时期的县城,至少应包含空间、制度与人群等多维度的理解。明中叶的筑城运动,在空间上划定了城区的范围;明清时期的城坊制度,又进一步将城墙内外在制度上进行了区隔;清中叶以后各姓建大祠于城内,则在观念上强化了城区的概念与意义。

[关键词] 地域社会史; 万载; 城池建置形胜图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2x(2015)02-0058-11

DOI:10.13469/j.cnki.zgshjjsyj.2015.02.007

宋元明清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城市地图发展的繁荣与成熟时期,其表现之一就是大量地方志中都绘制了要素丰富的城市舆图。^①如何解读与使用方志中的城市地图,已有的研究提供了“读图”与“读人”两种取向。前者的关注重点是地图。如胡邦波、阙维民从地图绘制方法的角度对方志地图要素展开分析,讨论的是地图如何绘制;^②章生道、李孝聪、鲁西奇、成一农在进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时,关注的则是地图绘制了什么内容,各空间要素在空间结构布局上呈现出怎样的特点。^③范德、葛兆光、潘晟等学者的讨论则属于后一种取向,关注的重点是与地图有关的人——由谁绘制,画给谁看,体现了怎样的知识与思想。^④本文则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尝试从静止的地图中,解读出城市本身生动而整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使用与解读方志地图增添地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

基于文献资料的丰富性以及实地考察的可能性,本文选择江西省西部与湖南接壤的万载县作为研究个案。^⑤万载地处赣江水系支流之一锦江的上游,五代十国时期正式设县,宋代开始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袁州府,持续至今。存留至今的方志中,最早的万载县城地图见载于康熙九年(1670)《袁州府志》,绘制最为详细的则是道光六年(1826)《万载县志》中的“城池建置形胜图”(简称“城池图”)。道光城池图的绘制者李光宁是一位监生,在地图绘制方面既有家学,又有专长。他的父亲李荣陞是清代万载县第一个进士,曾经任官湖南、云南、贵州等地,在山川地理方面颇有造诣,“足迹所到无不考求精确”,著有《云缅山川志》、《禹贡山川考》、《黑水考证》、《江源考证》等历史地理著作。^⑥李光宁长年随侍父亲左右,又擅长堪舆之术,“古道自持,精形家言,尤通六法”。^⑦道光三年(1823),李光宁受知县卫鹤鸣之聘,“承纂山川、水道、舆图、城池并庙署、书院、试宇等图”。^⑧为了绘制出较为精确的地图,他“亲诣各乡,遍历邻境,升高履险,寻脉络,考源流,察形势,审险要,格其方向,分其支派”,于次年据实亲手绘制了诸图。^⑨与此前康熙与雍正县志中的县治城池图比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近邻: 16至19世纪湘鄂赣交边山区的土著与移民研究”(批准号: 11YJC770038)之中期成果。

[收稿日期] 2015-03-09

较,“城池图”采用上北下南的方位取向,比例较为精确,绘制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因此也一直为清代及民国续修方志所沿用。一直到现在,万载县城老城区的空间形态与道光年间绘制的“城池图”也能大致对应,其资料价值与制图学价值自然不言而喻。魏幼红在研究明清时期江西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时,参考了同治《万载县志》中沿用的李光宁所绘城池图,对万载县城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进行过讨论,特别注意到城区居民以宗族、里甲等形式结成的共同体现象,从而在传统的城市史研究中增添了人群维度的关照。^⑩但是受研究主题以及资料的限制,魏幼红的研究关注的还是静态的结构,未能进一步对县城聚落结构化过程中,空间、制度与人群诸因素的发展进行动态与整体分析。本文结合笔者在万载城乡田野调查获得的地方感,对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中或显或隐的诸内容及其史料进行重新梳理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合东西置城”

“城池图”定格的是清道光时期的万载县城格局——城墙包围着的区域内,分布着城门、桥梁、坊巷、公署、庙宇等建置,一条河流穿城而过。此种格局的形成历程,通常是在方志中的“城池”部分进行论述,梳理的多是城墙、城门等建置的兴废过程,这与早期方志地图的绘制方式有着共同的旨趣。^⑪从清中期开始,方志地图的编绘已经呈现出日渐丰富的趋势,对于城市格局的历史重构,也需要突破原有的“城池”叙述模式,将地图中绘制的各种自然景观与人文建筑等一并纳入到整体的城市历史脉络中。

“城池图”中绘制的万载县城,是一个地处蜀江(锦江在万载境内的名称)南岸的丘陵盆地,自南北流的锦江支流龙河将盆地一分为二。在龙河的西岸有一座龙山,万载县城的历史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这座山。据道光《万载县志》记载:

古城在今治东北四十里罗城,孙吴黄武中建,名阳乐城,晋改名康乐。(详古迹)唐武德中,复名阳乐,徙龙山下,即今县治。(嘉定志)杨吴始名万载。宋因之,城垣修建无考。(按徐昇《修县治记》“割贼据郭郭”则宋时有城也。)

万载所处的锦江流域上游,其发展相较于南北平行的袁水与修水都要晚一些。西汉豫章郡所置十八县,修水上游有艾,袁水上游有宜春,锦江只有下游的建成设置了县。六朝时期,由于政权割据对峙,众建郡县,锦江流域的中游与上游新设了上蔡、宜丰、阳乐等县。随着隋唐的统一,锦江流域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整合,只保留了高安(即汉代的建成县)的建置。北宋欧阳忞在《舆地广记》中,记载了万载六朝至唐时期的行政变迁:

本阳乐县地,吴黄武中置。晋太康元年改为康乐,属豫章郡。宋因之。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即此。后省焉。唐武德五年,复置阳乐县,属靖州。八年,州废,省入高安。^⑫

唐以后的中国,再一次陷入分裂割据,江西地区持续被南方十国中的吴与南唐所统治,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体现在行政区划上则是新增了19县。万载也因为地方经济的开发,在杨吴时期设场,南唐时期升为县。宋代对江西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万载县由筠州府改隶袁州府。南宋初年的知县徐昇,在重修县治时回顾了万载在五代十国和宋朝时的行政演变:

万载本高安故地,初置场隶于洪,伪吴顺义元年也。后为县,隶于筠,则南唐保大十年也。皇朝下江南,遂割属袁州,则开宝八年也。宣和初,改曰建城,而复旧名则绍兴元年诏也。^⑬

万载县的政区沿革历史,在早期曾有过阳乐、康乐县的设置,但从唐初至南唐保大十年正式设县,期间出现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断层。两宋以后,万载的政区设置日趋稳定。为了接续上这段历史,开始出现了旧城与迁城的说法。

关于万载的旧县城,与晋代更阳乐县为康乐县,并作为康乐公(侯)的食邑有关。东晋南朝时期,先后有多人被封为康乐公(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谢灵运。谢灵运的才名,使其在世时就以

“谢康乐”而众所共知。^⑭尽管谢灵运是否到过康乐县境一直备受质疑,但这并不影响后人将谢灵运与康乐联系在一起。如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中就记载了万载县境内与谢灵运有关的一些古迹,包括一座康乐城:

古城在县东北四里,宋武帝封临川内史谢灵运为康乐侯,以侯就第,即此地也。其城周回山水,谢公无日不宴游。有书室、石砚犹存焉。^⑮

明正德《袁州府志》中,将康乐故城由“县东北四里”改为“县东二十里”,并明确记载县治迁到龙山下是在唐武德五年(622),即唐初复置阳乐县的年份:

康乐故城:在万载县东二十里,晋旧县,刘宋封谢灵运为康乐侯,即此地。^⑯

万载县治,在城西龙山下。吴黄武中置县,晋大(太)康中迁县治东二十里。唐武德五年复今治。成化二十年知县黄珙重修。^⑰

道光《万载县志》则进一步明确了万载旧城是东北四十里的罗城。万载县境内有两条主要河流,一条是北部的是泰溪,另一条是发源于萍乡的蜀江。两河在上高境内的镇渡合流,一起汇成为锦江。将县治从泰溪河畔的罗城迁到蜀江南岸的龙山下,表明了唐以后地域开发重心的转移。杨吴时期在蜀江的上游设万载场^⑱,南唐时由场升县,进一步巩固了新县城的中心地位。南宋知县徐昇在绍兴五年(1135)对万载县治进行了一次重修,此后历朝迭有修建,一直延续至清代。

随着武德八年靖州的并入高安,阳乐县城的功能也不复存在,而关于城区聚落的早期历史,目前能找到的资料多与寺庙宫观有关。“城池图”中地处龙河西岸的静安院,据称始建于唐初。据元代僧人柏庭于大德三年(1299)的记载,“龙江山净安院,自大唐武德八年(625)创建于县东北龙山之前”^⑲。这座寺院此后屡经修建,南宋嘉定九年(1216),“南泉山祖师普庵曾游于此,有钟铭垂于寺”,此后一直到清同治年间还曾有过募修的记载。

雍正《万载县志》的城图中,标示了县治以南有一座崇信寺。该寺由黄蘗山的断际禅师于唐代中期创建,元末毁于兵火,明代洪武和景泰年间两次重建。^⑳明清时期,在崇信寺周边先后建了多座衙署,如明代的僧会司、布政分司和清代的守备署。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崇信寺的旧址被改为文昌庙。嘉庆四年(1799),又改建成“城池图”中标绘出的考棚。^㉑

“城池图”中在城东有一座名为九仙宫的道观,其历史据说也可以追溯到唐代。方志中记载,这座九仙宫(观)开基于唐大和六年(832),其声名的远播则是因为元初一位名叫黄伯祥的道士。^㉒虽然与八仙一起飞升的故事带有传奇的色彩,但无论是在元人文集,还是明清的方志、族谱中,都能找到黄伯祥的相关记载。黄的族人自称是黄庭坚的后代,黄伯祥生活于宋末元初。在吴澄、虞集等元代文人的文集中,收录了他们为黄伯祥的两个儿子黄盅、黄璧写的文章。^㉓在县城有一处地名称为集贤坊,“旧传吴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欧阳文公玄尝集于邑人黄璧家,故名”。^㉔族谱中除了记载黄伯祥修道的事迹,还记载了另一件修桥的故事:

允仁(行百二)府君生子详,讳伯详,道号竹关。仁公克俭起家,坚心训子,命入南雍,授元广济库副使。详公五旬乏嗣,遂弃职归隐,揭囊捐修双虹桥,应知天之缁缁不爽其报,次年诞生二子,改名大虹小虹,因以双虹名桥。后长更名曰璧,次曰盅,俱皆荣达。^㉕

相传为黄竹关所建的这座双虹桥,是横跨龙河的第一座桥梁。大德年间,在龙河上又修建了一座南浦桥。双虹桥与南浦桥的修建,除了便利龙河两岸的交通与联系,也提醒我们注意,在没有建立起交通渠道之前,龙河就是一条天然的护城河。元代以前的万载县城,其范围只是龙河西岸至龙山的这片小盆地。而九仙宫与集贤坊的故事则表明,龙河东岸地区在宋末元初已经开始逐渐繁荣。

从唐代迁徙龙山之下,一直到元末,万载县城都还不是一个“城墙包围着的城市”(walled city),只是一个由县衙,以及散布在县衙周边的庙宇、桥梁,以及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民居等建筑组成的聚落。最早有筑城的记载,是在元末红巾军占领的时期。元至正十二年(1352),天完政权的欧

普祥率部攻占了袁州,直到至正二十年(1360)归顺朱元璋,期间曾长期割据袁州。当时占领万载的是欧普祥的部下刘仁,其统治期间,第一次修了城池,道光《万载县志》载:

元季,刘仁据县,另筑城于邑东隅,闾置四门,周围五里。(即今建城坊)明初,仁弟敬归服,城遂废,仅存北门城楼,(见黄自中谯楼记)设牌栅为防护。

正德《袁州府志》将这座刘仁所立的城,也视为另一座康乐故城。^⑤明初城废,但刘仁的割据不仅留下一座古迹中的故城,道光“城池图”中还绘制了至少两处相关的历史遗存。一处是花园里(巷)的地名,据说是因为“元至正间双刀手刘仁据县时开设,匠植花木”而得名。^⑥另一处是曾经的刘仁旧居,洪武三年(1370)改为城隍庙,一直保留至今。^⑦在“城池图”中,这两处遗存都在龙河东岸不远,表明刘仁建城时也极有可能以龙河为护城河。

明代是万载县城的城池修筑史上的重要阶段,特别是明正德年间,因为面临社会动乱的威胁,经多任县令的努力,最后完成了“合东西以置城”的筑城工程。

正德六年,华林盗起,知县陆璫议建城,以调去。八年,知县王甸就水西立子城,三门,东双虹,西胜迹,南南浦。十三年,知县张邦谷复合东西置城,筑土垣,架木覆瓦,高丈余,下广一丈四尺,上广八尺,东西相距二里,南北一里,延袤一千二百三十一丈,共约六里二百步。立七门,石砌其四,各建楼三间。东朝京,南南浦,西锦衣,北龙江。又小南门,小北门,小龙江门。惟龙江、乌石江隔流,龙江因石桥,乌石用木栅,以属于城。

从中国城市的城墙兴废史看,万载的个案无疑是明中期筑城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对于万载县城的发展历史而言,正德十三年(1518)张邦谷的“合东西以置城”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筑城,还在于“合东西”。元末刘仁筑城东隅,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双城格局——龙河西岸是没有城墙包围但有县治的老城区,龙河东岸是“置四门,周围五里”的城墙包围的军事割据新城区。明初刘仁归服后,城墙已经毁于战火,但是这种双城的格局仍然维持——县治仍然设在龙河西岸的龙山下,城隍庙则矗立在龙河东岸。正德时期的筑城运动,最初的计划是仅仅将县治所在的河西地区修建子城,显示出明代前期的双城格局中,龙河西岸更受重视。双城合一之后,逐渐也有一些文教建筑设在了河东,如道光年间的文昌庙与宾兴堂,但主要的行政文教建筑仍然集中于龙河西岸。

二、“省城坊为十三”

“城池图”中标示出了龙河两岸分布的十三个坊。作为一种城市管理的制度设计,坊的名称始于魏晋,一直到宋代也都是城市最基层的地域单元。^⑧到了明清时期,坊的结构与功能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表现形式,既用来表示纪念或表彰的牌坊,也可作为地理单元的坊巷街道,而黄册里甲制度中也仍然使用坊作为城市的基本单位。^⑨该如何从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中,理解诸如“城池图”中特意标示出来的这些坊的意义呢?

与明清的《袁州府志》不同,现存的几部清代《万载县志》中记载的坊已经将各种纪念性的牌坊排除在外。^⑩道光《万载县志》中关于坊的记载,分别出现在《城池》卷的“坊、街、市镇”与“都图”两部分中。在“坊、街、市镇”这一部分,道光县志第一次将城内的坊区分为水东岸与水西岸,分别罗列了每一个坊涵括的地理范围。此前的县志大都遵循旧志,列举了十九坊,而道光县志也是第一次将坊的数量考证确定为十四坊。

按嘉定志有孝义、裕众、肃政、双桂四坊。洪武志坊十六,曰弦歌、崇文、兴仁、康乐、集贤、福庆、安仁、福寿、仁寿、建城、宣化、文昌、孝义、锦衣、清宁、兴贤。考黄册为十九坊,无弦歌、崇文、兴仁、宣化、孝义、清宁,别有濠岭、明德、宋家、南浦、寿山、福海、建安、大田、仁孝,其总目无兴仁而东隅三图有兴仁,总目有福寿、大田而各图无福寿、大田,恐名有更易。旧志悉十九坊,今仁孝、文昌、濠岭、大田、福庆五坊皆废,所存惟十四坊。^⑪

根据前文的考证,宋代的万载县城实际上只包括“城池图”中龙河以西的部分。清道光时期的龙河西岸,也依然只有四个坊,与嘉定志^③所列坊数相合。

明代的坊数分歧,源于史源的不一。万载县修志始于明成化,此前关于县城的坊数,分别见载于明初的《大明志》和黄册。明末参与编修崇祯《万载县志》的邑人谭经济,将万载的修志传统追溯到了明初,“洪武改元之三年,即令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郡县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大明志》。”^④明初虽然拆去了元末刘仁所建的城墙,同时也接受了龙河东岸发展的现实,所以新设了建城等坊。由于城区的面积扩大,坊数也大幅增加。但《大明志》的编修毕竟仓促,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朱元璋命令全国开始编制黄册,划定“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各编一册,册首为总图”城乡的登记册汇总后,由州县官府编成本州、县的总册。^⑤从统计的全面性与规范性而言,黄册登记要强于《大明志》,因而出现坊数的增多。此外,明初政局甫定,地名的称呼并没有完全规范,所以也难免“恐名有更易”的可能。

在“都图”部分,万载县城的图甲体系也是分为东、西两都,每都各统四图,每图各统十甲。其中,每图的范围均以坊计,包括一坊、二坊或三坊不等,但并不完全按坊所在的地理位置来划分,龙河东岸的南浦坊和仁寿坊分别被归入西都的三图和四图。

表1 道光县志“坊、街、市镇”中所列各坊

水东岸	建城坊、安仁坊、仁寿坊、集贤坊、康乐坊、龙江坊、兴仁坊、福寿坊、南浦坊
水西岸	明德坊、锦衣坊、兴贤坊、建安坊

表2 道光县志“都图”中所列各坊

东隅为东都	一图	安仁坊、建城坊
	二图	集贤坊、康乐坊、龙江坊
	三图	兴仁坊
	四图	福寿坊
西隅为西都	一图	明德坊、锦衣坊
	二图	兴贤坊
	三图	南浦坊、宋家坊
	四图	建安坊、仁寿坊

对比表1和表2,县城图甲体系中包括14坊,而表1以及“城池图”中都只有13坊,没有西都三图中的宋家坊。宋家坊包括的地理空间,都在县城城墙以外的区域。而道光县志的编者,也在“都图”部分考证梳理县城图甲时,对于“十三城坊”的演变进行了解释:

按万邑立县时,统高侯、万载、进城、康乐四乡。南唐保大十年改高侯为怀旧。宋南渡后,改康乐为欧桂,旋分欧桂为东西,遂为五乡。其时城统四坊,乡统二十八里,知县范如璋行保伍之法,著名天下,朱子称之。明洪武初,因乡定区,区设粮长四人,在城分二隅,统十九坊,是为五乡首区。乡分二十四都,设图凡一百有四,图编十甲,轮甲充长。隅图曰坊长,乡图曰保里正。宏治八年,知县张文增西隅三图为四图。崇祯时,知县韦明杰省二十四都之四图入三图,国初省城坊为十三,乡都仍旧。^⑥

宋家坊之所以进入县城的图甲体系中,首先是因为宋家坊离城很近,此外在正德十三年“合东西置城”以前,并没有明确的城内城外之别。进入清代,城墙包围着的十三坊开始有了“城坊”的区分,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据当地人调查,一直到民国时期,每年端午龙舟竞渡,县城十三坊每坊都有一条龙舟参与。^⑦

表 2 两隅(都)八图体系的建立,与明朝先后两位万载知县有关。一位是明初的赵中:

赵中,字允中,怀宁人。国初知万载县时,红巾残毁之后,民尚转徙,不遑宁居。中劳来还定,未几悉复。县郭居民初尚不满百户,后致六七百户,遂置七坊厢。县厅谯楼庙学皆中所建。^⑧

洪武志与黄册中都有的“福寿坊”就是他在“吴元年”所建的。而且赵中“遂置七坊厢”的原因,是随着时局的稳定以及招徕措施的推行,因元末动乱出现的县城居民人口减少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从一百户增加到六、七百户。明代府志中记载赵中所置为“七坊厢”,但所有文献中都没有厢的记载。这需要与明前期万载的县城格局结合起来考虑。前文已经讨论到,元末刘仁所筑城墙的毁坏,使得龙河东西两岸形成双城格局。而“七坊厢”的设置表明,在筑城以前,龙河的西岸是“在城曰坊”,东岸则是“附城曰厢”的。在“合东西置城”之后,龙河东西两岸都是城坊,自然也就没有了厢的区划。赵中置的“七坊厢”,到了弘治八年(1495),知县张文又增加了一图^⑨,最终形成了分东西两隅,每隅各统四个图,每个图又包括十个甲户的万载县城城区里甲登记体系。这也表明,明初赵中所置的“七坊厢”,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图”。按照国家的制度设计,城中曰坊,但城内自宋以来已经有了作为地理社区组织名称的坊名,因此到了明中期以后,里甲体系中的“坊”就为“图”所取代。^⑩这一制度设计经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之后,在雍正、乾隆年间再次进行了重新整齐划一,从名称上将隅改成都,最终形成全县统一的区、都、图、甲的格局。正是因为作为户口登记的“都—图—甲”体系始终保持稳定,所以作为地理方位名称的坊,其数量无论是统计为 16、19 还是 14,对于国家的赋役征派都不会造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增图与修筑城墙分别看成是制度与空间层面县城格局最终定型的表征,那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基本是同步的。知县张文增七图为八图是在弘治八年(1495),知县张邦谷阖东西置城是在正德十三年(1518),相距不过二十余年。而县城二隅八图所辖各坊,除了宋家坊位于南门以外,其余都被城墙包围在内。到了明代中叶,无论是就制度层面还是地理空间而言,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万载县城城区的概念。

三、“建大祠于城内”

相比此前仅列出官署、庙宇、书院、粮仓等建筑的方志县治图,道光“城池图”不仅标注出制度规划设立的在城十三坊,还绘制了城区的街、巷与居民聚落,如县治前的衙前大街,城隍庙周边的务前街与后街,宾兴堂附近的谭家巷,以及司背、田下等聚居区。这些街巷构成了城市的肌理,使明代以来“目中无人”的方志地图因此而鲜活丰满起来。县城街巷串连起的,除了“城池图”中已经绘制的官署、庙宇和文教类建筑,还有大量未标示出的民居、店铺以及宗族祠堂等建筑。万载县城的两个历史街区,其中一个位于龙河西岸靠近小南门的田下,保留了大量的宗族祠堂建筑。根据测绘整理与调查考证,田下街区的核心区域密集分布着八座祠堂,其修建情况整理如下:

表 3 田下街区核心区域祠堂修建情况表

	祠堂	建造历史	史料及来源
1	郭氏大祠	始建于天启七年(1627),康熙四十五年(1706)至乾隆五年(1740)历有重修,最后一次重修记录为嘉庆九年(1804)	郭大经《田下郭氏重建大祠记》,郭士选、士逵、士逢《田下郭氏祠堂》,夏侯仑《郭氏祠堂第一门记》,郭达《田下郭氏重修祠堂记》,俱载民国《万载田下郭氏族谱》卷首一《祠堂基宇图记》页 2-6。
2	周家祠堂	始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六十年(1795)竖造门楼,建立六世同居义门坊表,道光二十一年(1841)重修,光绪二十三年(1897)添修围墙	周治康《祠堂记》,周树楷《续造田下祠堂记》,周永清《天修围墙记》,俱载民国《万载田下周氏族谱》卷首,页 8-12。

3	郭南轩公祠	始建于道光初元,重修于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二年(1876)	郭序《田下郭南轩公祠堂记》,载民国《万载田下郭氏族谱》卷首一《南轩公祠宇图记》,页2-4。
4	郭氏烈公祠	修建于道光至同治年间	郭序《田下郭南轩公祠堂记》。
5	高家祠堂	修建于道光十一年(1831)	高科寿:咸丰十一年族谱《原序》,载1994年修《万载绵村高氏族谱》卷首,页19-20。
6	张家祠堂	同治七年(1868)八房合建“谷公祠”,民国三十二年(1943)改为“张氏大宗祠”	张会文《序》,张堂熙《原序》,俱载民国《张十房祠主牌田产册》。
7	郭绿阴公祠	修建于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二年(1876)	郭曾畴《田下郭绿阴公祠堂记》,载民国《万载田下郭氏族谱》卷首一《绿阴公祠宇图记》,页2-3。
8	易家祠堂	修建于民国十年(1921)	易定国《易氏宗祠记》(2005年撰),载2007年《全国易氏通谱江西卷》第752-753页。

在田下建造了祠堂的五个姓氏,其迁万的始祖均可追溯到宋代,属于万载地域社会较早的居民。各姓在城区修建宗族祠堂建筑,则是一个自明末开始层累叠加的历史过程。第一座祠堂修建于明天启年间,清初的百余年间,也仍然只有郭氏大祠和周家祠堂两座。嘉庆、道光以后,大量宗族祠堂才修建在了龙河西岸这片历史悠久的老城区。田下街区的八座祠堂,是清代万载县城祠堂发展的一个缩影。关于万载县城祠堂数量,先后有过三组统计数据。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万载知县公文中,全县一共有36座祠堂,在城16座,在乡20座。^①民国二十九年(1940)的《万载县志》标注籍贯或居址为城区范围的有20个姓氏,建祠73所。^②1983年万载县“康乐镇志编写小组”的调查,有34姓在县城建造了99栋祠堂。^③

田下祠堂层累叠加的历史过程,再一次印证了学界关于明清时期地方宗族发展的基本认识,即自明中后期开始的组织化与普及化的发展趋势。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为何这些祠堂纷纷选择建在城墙包围着的城区范围之内?这不仅是一个宗族史的问题,更是一个与城市史相关的命题。

表3中的8座祠堂,郭氏建祠时间最早,所建祠堂数量也最多,有4座。郭氏宗族之所以建祠于田下,是因为他们世代聚居于此。始迁祖郭世兴宋末元初自吉安迁入田下定居,至明初“人与文两盛”,七世孙中的郭瑾考中进士,官至都给事中,其兄郭琼也贡入国子监。在明清的图甲体系中,田下所属的西隅(都)二图,郭氏占了十甲中的两个甲户,即四甲郭宠与七甲郭政。因此,田下郭氏是典型的聚居于城、占籍于城,从而建祠于城的县城著姓望族。

周家祠堂是第二座建造于田下的宗族祠堂。周氏宗族在明、清两代皆因“义”行而受旌表,但在科举方面并没有突出的成就。明景泰四年(1453),族人周仲信因捐谷赈灾而受旌表为义士,其建于田下的住宅门前还竖立了石狮营鼓。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周氏族人大都迁居乡村。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其迁居黄茅山区的族人周继德因六世同居而被旌表为义门。周氏宗族建祠田下,除了因为曾经有座义士公的旧宅,更主要是因为他们以户名周文占籍西隅(都)一图一甲。在田下建祠的周氏、张氏和易氏,均属于占籍于城而聚居于乡的宗族类型。

道光年间建造的高家祠堂,既没有在城区的图甲体系中占籍,也不是聚居于县城,其建祠于田下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方志中所载高湘文的传文,提示我们可以从明清时期城居士绅与地方社会的角度进行整体考虑:

高湘文,字位庆,号鉴浦,举人。家贫力学,以能文称,学使仁和赵公尤器之。两主讲龙河书院,孜孜启迪,后多为知名士。性孝友,笃宗盟。始族人散处各乡无所统一,始祖蒸尝亦阙,湘文与同志

多方纠合,创建大祠于城内。又以本支郡城试馆公诸合族,自是群情大和,科名亦盛。五旬后,由大挑司铎弋阳,教士勤恳如主讲龙河时,又捐清俸倡修学宫、考舍及谢文节公祠,士翕然向风。洎卒官,崇祀德馨祠。生平耿介自持,公事罕预,然当大利害,执义侃侃,不能为众势屈。著有文集待梓。子树桂、树梧,文庠。^④

高湘文出生于欧桂西乡二十都五图,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嘉庆元年(1796)拣选知县,嘉庆十七年(1812)获得弋阳县的教职,卒于任上。他既是田下高氏祠堂最主要的倡建者,同时也是乾隆、嘉庆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城居士绅代表。科举的成功,使得他的活动与交游也由乡村转移到县城,两次主讲龙河书院,与辛从益等人结成文社,参与到应对“学额案”、管理考棚等文教公共事务中。^⑤嘉庆、道光以后,万载县城逐渐形成“各姓氏之宗祠家庙,林立栉比”的景象,与城居地方士绅的推动不无关系。

田下的8座祠堂,除了郭氏建有3座支祠,其余各姓所建均为联宗祠,即当地俗称的“大祠”。高家祠堂奉宋祖燕山公为始迁祖,参与建祠的有县城以西的六房和县城以东的四房。^⑥张家祠堂在同治年间为八房合建,民国时扩充为十房宗祠。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万载城乡各地的十七支李氏在县城安仁坊创建大祠,据参与其事的李荣陞回忆,此举的促因乃在于大祠已然成为标榜古户大族地位的象征:

吾县风气近古,族而居者必遵家礼为祠堂,以严岁祀而洽其族。辛、彭、宋、郭且无论,如张、王、龙、刘、陈、周、唐、鲍、易、胥之属,城内外十余祠相望,而吾李独前未有。^⑦

清中叶以后,“建大祠于城内”成为万载各宗族联络城乡,标榜传统的一种重要方式。

四、结 论

对于方志地图,不同的读法回应的是不同的问题意识。从地域社会史的视角解读方志城市舆图,关注的重点是城市本身的历史脉络。“城池建置形胜图”定格了道光初年的万载县城,地图中丰富的信息提供了复原城市形成历史中的几个维度。

明代中期开始修筑的城墙之内,始建于唐代的寺庙,南宋开始修复的县治衙署,元代沟通两岸的桥梁,明代的城隍庙,以及清代嘉道年间新修建的考棚、文昌宫、宾兴堂等建筑,共同构成了空间地理层面的万载县城。以城墙的兴修为线索,我们可以将县城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唐代至元代的“城垣修建无考”,元末至明正德以前的东西双城,以及正德以后的“合东西置城”。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万载县城的地理范围也从最初的龙河西岸扩展至东岸,最终形成城墙环绕、龙河穿城而过的空间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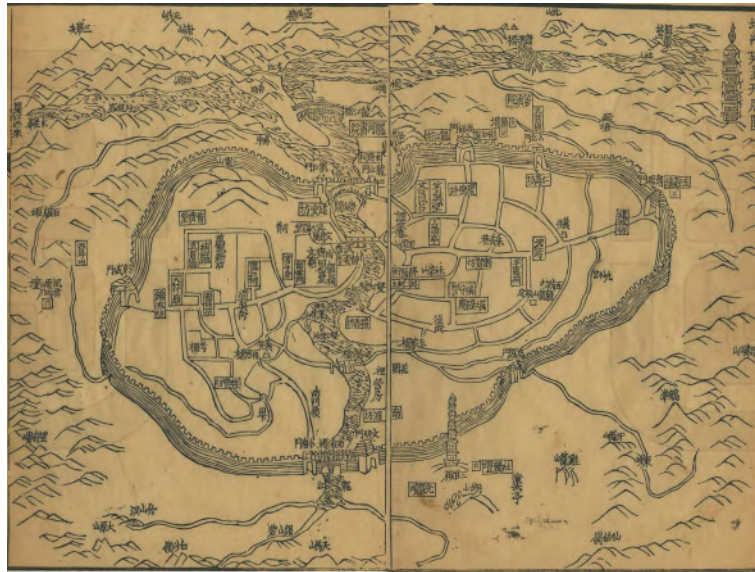
龙河两岸被划分而成的十余个城坊,构成了制度层面的万载县城。由宋至明城坊数量的增加,是城区地理空间拓展的体现。明清时期城坊数量的纷繁歧异,则是坊既作为地理方位概念,又作为国家的制度设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共存的反映。

田下街区密集分布的宗族祠堂,则为重构县城历史提供了人群的维度。宋元明时期迁入万载及县城居住的居民,从明后期开始进行宗族组织化的建构。如果说明中叶的修筑城墙与完善城坊图甲体系,从空间与制度层面完成了万载县城的建构。那么清中叶开始,万载各姓纷纷“建大祠于城内”的举动,则在观念上强化了城区的概念与意义。

就结构与功能而言,空间、制度与人群三个维度分别建构了自唐以来万载县城的历史。但道光四年绘制的“城池图”展示的,是一个作为整体的明清时期县城图景。要进一步理解县城的意义,还需要回到李光宁用力最深的“县境疆域全图”中,将城区形成的过程与城墙之外广袤的地域社会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

附录一：同治《万载县志》“城池建置形胜图”



注释与参考文献：

- ①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舆图研究》载编委会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商务印书馆2011年。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关于方志地图发展概况,可参考邱新立《民国以前方志地图的发展阶段及成就概说》,《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2期。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文献》2003年第3期。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城市舆图”还是“城市图”,都是现代学术概念。在古代方志中,并没有统一的名称。仅就清代的江西方志的统计,就有包括“县治图”、“县城图”、“县郭图”、“街市图”、“城池图”、“城池廨署图”、“县坊图”等各种地图名称。
- ②胡邦波《景定〈建康志〉和至正〈金陵新志〉中的地图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7卷第1期,1988年。《景定〈建康志〉和至正〈金陵新志〉中地图的绘制年代与方法》,《自然科学史研究》第7卷第3期,1988年。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5卷第4期,1996年。
- ③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成一农前揭文。
- ④(美)范德(Edward L. Farmer)著,吴莉苇《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葛兆光《古舆图别解——读明代方志地图的感想三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潘晟《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二文均收入氏著《地图的作者及其阅读:以宋明为核心的知识史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 ⑤明清时期万载县城的文献资料,除了常见的方志外,还有大量族谱文献。清代万载图甲册中登记的城区八十一个甲户,已经收集到将近七十一个甲户的族谱。万载县城也还保留了大量清代以来的民居建筑、街巷格局,比较集中的有田下和小北关两处历史街区。
- ⑥《崇祀乡贤祠实录》,光绪《高村李氏谱(东房)》曾卷《家集》。这几种地理著作分别被胡思敬收入《问影楼舆地丛书》与《豫章丛书》刊刻出版。
- ⑦同治《万载县志》卷二十《人物》下,页20b。

- ⑧李敷敦《三伯祖罗山处士家传》,光绪《高村李氏谱(东房)》曾卷《家集》。
- ⑨李光宁《图说》,道光《万载县志》卷首。李光宁所绘诸图包括:县境疆域全图、城池建置形胜图、学宫图、公廨图、龙河书院图、考棚图、文昌宫图、武庙图。其中的“县境疆域全图”采取的是计里画方的绘图法,“仿勾股法,纵横斜直,互相参对,准以开方,作飞鸟图”。
- ⑩魏幼红《明清时期江西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武汉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1、69-70、107-110页。
- ⑪自道光时期开始,清代万载县志的“城池”单列一卷,其内容不仅沿袭前志旧说,并附有编修者的简单考据,可作了解城池历史的基本线索。道光十二年《万载县志》卷四《城池》,天津图书馆藏。
- ⑫欧阳忞《輿地广记附札记》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册,第261页。
- ⑬徐昇《徐令修县治记》,康熙《万载县志》卷十三《艺文》,页2。
- ⑭《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二十七,中华书局版1974年版,第1743页。
- ⑮乐史《宋本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九,页七,中华书局2000年影印本,第167页。
- ⑯正德《袁州府志》卷五《古迹》,页12b。
- ⑰正德《袁州府志》卷四《公署》,页5a。
- ⑱虽然杨吴所建万载场的具体位置已不得而知,但极有可能与万载县西部与湖南浏阳交界的铁山界有关。现代地名调查,此地境内有铁矿,相传元初建有炼铁炉。江西省万载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江西省万载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4年版,第143页。
- ⑲载雍正《万载县志》卷十三,页67b。雍正县志的城图中标注的寺庙名称为“净安寺”,道光以后均标注为“静安寺”。
- ⑳雍正《万载县志》卷四,页16b。雍正县志中将崇信寺的开基时间定为咸亨三年,此说遭到后人的质疑,认为应该在会昌、大中年间,参见同治《万载县志》卷二十二《仙释》,页2-3。
- ㉑同治《万载县志》卷八。
- ㉒“元道人黄伯祥号竹关修真于此,偶有八人过黄求碗以食,黄即与不取。继而邑人有客襄阳者,遇八人,知其与黄同里,即以前碗付之曰:‘归汝竹关,且言吾辈非坐囊人也。竹关当即寻我于蓬岛。’因忽不见。客归,语黄。黄未几飞升。”载雍正《万载县志》卷四,页25a。
- ㉓吴澄《黄璧元瑜字说》,《尚古堂记》。虞集《大本堂记》,《三新宣圣庙记》。
- ㉔载正德《袁州府志》卷三,页6a。
- ㉕民国三十五年(1946)《万载芟湖黄氏族谱》,卷末《原传》,页1b,2a。
- ㉖正德《袁州府志》卷五,页12b。
- ㉗康熙《万载县志》卷一,页11b。
- ㉘正德《袁州府志》卷五,页5a。
- ㉙关于宋代及此前坊制的源起、发展与演变,最新的梳理与概括可参考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第103-133页。
- ㉚魏幼红《明代地方城市的“坊”——以江西省府、县城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余清良:《明代“乡”、“区”、“坊”、“厢”、“隅”含义考析——以福建地区为例》,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第11辑,第116-117页,黄山书社2010年版。刘凤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第49-54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㉛明代正德与嘉靖的两部《袁州府志》,虽然列有“坊巷”之目,但列举的坊名中也包括大量牌坊。清乾隆《袁州府志》开始,则径直以“坊表”为名。
- ㉜道光十二年《万载县志》卷四《城池》,页8-9。
- ㉝据易平考证,宋嘉定间曾修纂了一部《袁州新编图经》,今佚。见黎传纪、易平著《江西方志通考》下册,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424页。
- ㉞康熙《万载县志》卷首《原序》,页15。关于《大明志》的纂修情况,可参考谢贵安《〈大明志书〉纂修及特点考论——兼论朱元璋的狭隘心胸》,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安徽省古籍出版办公室编《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

书社 2005 年版 第 37 - 52 页。

- ⑮《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五,“洪武十四年春正月”。另参考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 ⑯道光十二年《万载县志》卷四《城池》,页 11。
- ⑰易定国、宋开桂《龙船》,《万载古城故事》(评审稿)第 15 页。
- ⑱正德《袁州府志》,卷六,页 46b。
- ⑲据康熙《万载县志》,西隅四图的设立,是因为“弘治八年,邑令张文以户口繁伙增为四图”,卷一,页 12b。
- ⑳明清广东乡村推行里甲制度时,也有类似现象,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8 - 41 页。
- ㉑《万载锦衣坊陈氏族谱》提要卷首《存祠案略》,页 30 - 32。这次官方对宗族祠堂的调查统计,与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辅德施行的祠禁政策有关。
- ㉒民国《万载县志》卷三《氏族·宗姓表》。
- ㉓万载县志编纂办公室编《修志简讯》第 5 期,1983 年 1 月 8 日。《县志办公室修志简讯》,万载县档案局全宗号:1012。1983 年的康乐镇辖区范围比传统的万载县城区范围要大,这对统计数据有一定的影响。
- ㉔同治《万载县志》卷二十《人物》下,第 41 - 42 页。
- ㉕高树梧《鉴浦公行述》,道光乙未(1835)撰,载 1993 年《赤陂高氏族谱》卷末下《行述》,页 3 - 5。
- ㉖高湘文《县大祠享簿序》,载 1995 年《古岭高氏族谱》。
- ㉗李荣陞《安仁坊李大祠述》,民国《万载安仁坊李大祠章程》。